



军事情报学

—— A STUDY ON MILITARY INTELLIGENCE ——

高金虎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军事情报学

—— A STUDY ON MILITARY INTELLIGENCE ——

高金虎 著

▲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军事情报学/高金虎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12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情报研究丛书)

ISBN 978-7-214-20008-2

I. ①军… II. ①高… III. ①军事情报 IV. ①E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05434 号

书 名 军事情报学

著 者 高金虎
责任编辑 戴亦梁 范渊凯
责任校对 陈 颖
装帧设计 许文菲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镇江中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27.75 插页 1
字 数 36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20008-2
定 价 6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导论 1

第一节 军事情报学的发展历程 1

- 一、军事情报工作简史 1
- 二、影响军事情报工作发展的因素 7
- 三、军事情报学的形成 17

第二节 军事情报学学科体系 27

- 一、军事情报学的学科体系 28
- 二、军事情报学与信息科学 30
- 三、军事情报学的科学性 32

第三节 军事情报学的基本范畴 33

- 一、知彼与知己 33
- 二、实力与意图 40
- 三、公开与秘密 44
- 四、情报分析的科学与艺术性 48
- 五、对外情报与反情报 51
- 六、情报搜集与情报分析 54
- 七、情报分析与战略决策 58

第一章 军事情报概述 67

第一节 情报与军事情报 67

- 一、情报是信息 67
- 二、情报具有知识性 71
- 三、情报是信息和知识的增值 75

第二节 军事情报的功能 77

- 一、情报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77
- 二、情报是最高统帅部的战略哨兵 79
- 三、情报是行动的先导 80
- 四、情报是战斗力倍增器 84
- 五、情报是推进国家利益的秘密工具 86
- 六、情报是进行威慑的有力武器 87

第三节 军事情报的分类 89

- 一、战略情报 89
- 二、战场情报 105

第二章 军事情报工作 117

第一节 情报体制 117

- 一、情报体制的演变 118
- 二、情报体制的管理 123

第二节 情报人员的基本素养 132

- 一、坚定的政治信仰 133
- 二、过硬的心理素质 136
- 三、合理的知识结构 138
- 四、敏锐的情报意识 140
- 五、严密的思维能力 141
- 六、扎实的语言能力 143

第三节 情报流程 144

- 一、情报生产的基本流程 144
- 二、情报周期和情报流程 154

第三章 情报搜集 157

第一节 秘密人力情报工作 160

- 一、秘密人力情报工作概述 160

二、秘密人力情报工作技巧	168
第二节 技术侦察	210
一、技术侦察概述	211
二、技术侦察手段	213
三、技术搜集平台	229
第三节 公开来源情报资料搜集	244
一、公开来源情报工作概述	244
二、公开来源情报资料的类型	252
三、公开来源情报搜集的特点	256
四、公开来源情报搜集的作用	259
第四章 情报分析	263
第一节 情报分析概述	263
一、情报分析定义	263
二、情报分析简史	271
第二节 情报分析流程	275
一、确定情报目标	277
二、定义情报问题	278
三、形成并验证假设	280
四、分析情报空白	287
五、关联情报资料	289
六、提供竞争分析	297
七、分析替代方案	300
第三节 情报产品要求	303
一、客观	303
二、准确	305
三、先知	305
四、及时	307
五、完整	308
六、相关	309
七、易用	310
第四节 情报分析思维	311
一、逻辑思维	312

二、批判性思维 324

三、创造性思维 332

四、常见思维误区 339

第五节 情报分析失误 349

一、思维模型的局限 349

二、搜集能力的不足 351

三、“噪音”的干扰 351

四、信息共享障碍 354

五、敌方战略欺骗的影响 356

六、情报分析方法的缺陷 359

七、“狼来了”症候 362

第六节 情报分析失误的避免 365

一、建立协调的情报体制 365

二、营造开放的情报工作氛围 366

三、提高情报人员的分析技能 367

四、使用科学的情报分析方法 369

第五章 反情报 371

第一节 反情报概说 371

一、反情报定义 371

二、反情报的进攻性 374

三、反情报的环节 377

四、反情报的作用 380

第二节 反情报措施 383

一、拒止措施 383

二、侦查措施 386

三、欺骗措施 390

第六章 隐蔽行动 392

第一节 隐蔽行动概说 392

一、隐蔽行动定义 393

二、隐蔽行动与秘密活动 396

三、隐蔽行动与情报活动 397

第二节 主要隐蔽行动类型 400

一、政治战 400

二、心理战 407

三、经济战 413

四、准军事行动 414

五、突击行动 422

主要参考文献 424

后记 431

著述目录 434

导 论

军事情报学是研究军事情报特性、军事情报工作规律和军事情报工作指导规律的学科,是人们对军事情报工作实践的理性思考和概括总结,是指导军事情报工作的理论基础。其基本任务是揭示军事情报工作规律,阐明军事情报工作的理论与方法,指导军事情报工作实践。

第一节 军事情报学的发展历程

军事情报学是军事情报工作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历史极为悠久。在从事军事情报活动的过程中,人们对军事情报工作逐步有了理性认识,军事情报学开始形成。

一、军事情报工作简史

情报始于战争,最早的情报活动践行者是间谍和侦察兵,以间谍为核心的人力情报是最主要的情报来源,间谍活动几乎是情报活动的代名词,早期情报史实际上是间谍活动史。因此,英国学者菲利浦·奈特利

(Phillip Knightley)称间谍为“世界上第二种最古老的职业”^①。

早期的情报活动多是一种自发性活动，而不是一种自觉行为，因此多呈片断性或脉冲性。战前的间谍活动相当频繁(如孙子要求“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而一旦战争结束，这些战时的间谍则作鸟兽散，完全不存在现代秘密人力情报工作所强调的专业性、连续性、预见性。这种现象在 20 世纪之前都无改变。

由于缺乏专业情报机构，间谍活动多为决策者亲自掌控。在很多时候，决策者甚至亲自充当间谍。从残留的埃及象形文字中，我们可以发现埃及法老用间的实例。公元前 18 世纪的文献表明，古巴比伦王汉谟拉比曾向敌后派遣间谍，并要求他们尽量捕捉“舌头”以获取情报。中国有记载的用间实例始于夏之少康：少康“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孙子也提到“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伊尹和姜尚既是决策者，也是情报工作的组织者。犹太人的先知摩西也是如此。在常设性情报机构成立之前，这是一种普遍现象。

间谍以获取对手的实力和意图为目的，但在战争中，仅了解敌情是不够的，明智的军事家还需要了解天候与地形，如孙子指出：“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天候、地形与敌情构成了战场环境，是一个指挥官所必须掌握的知识，地图测绘部门因而成为第一个专业的“情报机构”^②。公元前 2300 年的古巴比伦泥版文书保留了世界上最古

① Phillip Knightley, *The Second Oldest Profession: Spies and Spying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Pimlico, 2003. 中文版翻译为《谍海风云》，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 1988 年版。

② 有些国家迄今未将地图测绘作为情报机构的职能，但美国的地形情报工作相对发达。1972 年美军整合地形测绘机构成立国防测绘局，2003 年成立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美军《联合情报》规定：“联合部队所属各种部队拥有极其广泛领域的信息，包括己方、中立方、敌军和平民等。同样，还有涉及天气、地形、文化因素和作战环境其他方面的大量信息。这些信息经过处理后被提炼成情报，用于预测敌方的能力和意图。正是这种预测性使情报有别于指挥官拥有的其他海量信息。”参见 U. S. Joint Chiefs of Staff, *Joint Publication 2-0, Joint Intelligence*, 22 June 2007, Chapter I, p. 1.

老的陆地地图；古希腊的地图制作技巧相当熟练；出土于马王堆汉墓的西汉地图的精确度相当高，主区的精度超过采用现代测绘技术以前的种种地图，就是比之于清代以实测为基础绘制的《大清一统舆图》也毫不逊色。^① 至迟至隋代，朝廷已设有专门负责地图事务的职方司，隶属于兵部尚书。此种情景，在其他文明古国亦然。

从 1618 年开始，欧洲各国爆发了一场持续 30 年的大规模的国际战争。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开始兴起，独立的民族国家开始形成。随后出现的工业革命则使资本主义完成了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发明和创新，科学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政治制度的变革、战争的实际需求和经济、技术的革命，为军事革命奠定了深厚的物质基础。从尼德兰革命开始，欧洲开始了一场持续 200 年时间的军事革命。军队的体制、编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建立在普遍义务兵役制基础上的常备军，出现了类似于现代军队的专业作战指挥机构——司令部。战争指挥的复杂化，使以单个统帅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体制，让位于由受过训练的职业军人组成的常设性的总参谋部指挥体制。在这种新的指挥体制下，决策者只就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作出最终决策，而战争指挥则交给总参谋部去完成。

这里面最重要的是 1789 年发生的法国大革命和随后的拿破仑战争。革命时期的法国四面受敌，法军不得不在多个战线同时作战。为了适应这种新的战争需求，拿破仑设立了由参谋长办公室和总参谋部组成的统帅部。这种制度成为近代参谋制度的萌芽。当普鲁士人重建军队之时，沙恩霍斯特(Gerhard Johann David von Scharnhorst)首先在军政部成立了一个特殊组织，以收集情报，考虑战略和战术问题，具体准备作战行动。这是参谋部的雏形。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初，奥匈帝国、法国、俄国、日本、美国 and 英国等先后建立起总参谋部或类似的机构。

^① 参见葛剑雄《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第 3 页。

总参谋部制度是军事统帅体制的重大变革,它对于军事情报工作有着重大影响。在总参谋部体制下,军事情报机构成了统帅体制的组成部分。由于总参谋部本身是一个常设机构,依附于它的军事情报机构也因而改变了间隙性、暂时性特点,而成为常设性机构。比之于萌芽时期的情报工作,总参谋部情报体制的创立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

新的指挥体制使作战指挥的效率大为提高,但由于人们对战争、战略认识的局限,近代情报工作在情报机构的设置、情报的搜集、情报分析水平和情报—决策关系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在19世纪末,即便是最成熟的陆军情报机构,其情报工作水平依然很低。^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人们认识到,以机器大工业和四通八达的铁路网为依托的现代战争,已经把全体国民(不分阶级)绑在了战车上,前方和后方的界限日益模糊,以王霸为目的的王朝战争,已经转变成一场卷入全民族的总体战争。决定战争胜负的不仅仅是常备军的数量,还要看一个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战争潜力和抵抗侵略的民众士气。人们逐渐认识到,在军事安全与国家安全之间不能画等号。情报工作开始涉及经济因素、国民士气等非军事领域,战略情报观念开始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情报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推动了情报工作的发展,促进了情报观念的成熟,并直接影响了战后的情报工作。消除情报工作中的重叠现象,提高情报机构的工作效率,为决策者提供协调一致的情报,成为各国情报界的共识。为战略决策服务的国家情报机构和国防情报机构开始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对情报的搜集、处理与分发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新的情报搜集手段不断出现,专业的情报搜集机构随之建立,“烟囱式”情报体制就此形成。在这种“烟囱式”情报体制下,各个情报门类都有独立的搜集、处理、分析和分发途径,情报搜集的

^① 参见 Christopher Andrew, *Secret Service: The Making of the British Intelligence Community*, London: Guild Publishing, 1985, p. 20.

效率大为提高,但它们之间互不连通,各个部门之间的信息不能共享。

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兴起,国际安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而传统的“烟囱式”情报体制在应对这些非传统安全威胁时明显反应不力,情报失误频频发生。革新“烟囱式”情报体制,动员全民族的智力资源,整合情报界掌握的全部信息,共同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满足国家、军队和其他部门对情报的需求,形成一个分统有序、协调一致、信息共享的情报体制,是情报改革的必然选择,也是21世纪情报工作的发展方向。

随着信息技术在军事中的广泛运用,战场的透明度大幅提高。2001年,美国国防部率先提出了C⁴KISR的新概念,将各类武器平台,即“射手”的杀伤、摧毁能力加入了C⁴ISR系统。分布在不同空间的各类传感器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传感器网络,对战场进行全方位、全频谱、全时段的侦察监视,一体化C⁴ISR信息系统将传感器探测到的目标信息迅速传输到武器系统,指挥和控制武器系统对目标进行打击。实时的情报侦察、指挥控制、火力突击以及实时的战损评估集成一体,“从传感器到射手”实现了无缝链接。

搜集技术的发展和搜集能力的提高,导致信息数量激增。各种信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传媒的发达和资讯的易得性,使每个掌握一定技巧的人都能从事情报工作。情报的知识性、信息性特征更为明显。美国中央情报局资深分析家布鲁斯·伯尔考威茨(Bruce D. Berkowitz)和阿兰·古德曼(Allan E. Goodman)以毋庸置疑的口气声称“情报就是信息”(Intelligence is information)^①,这种表述过于绝对,但并非全无道理。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信息获取能力获得极大提升,但信息处理能力却

^① Bruce D. Berkowitz & Allan E. Goodman, *Best Truth: Intellig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reface, x.

没有获得同步提升,信息处理成为制约情报工作的瓶颈。尽管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已经使信息处理部分实现了智能化,但这种智能处理技术远没有达到与情报搜集能力相匹配的程度。大量的信息沉睡在数据库中。美国学者帕特里克·麦克加维指出:“我们几乎拥有不受限制的信息搜集能力,但只有很少人对这些信息的效用提出质疑……结果是可怕的:越来越多的信息被搜集,而它们的价值却越来越小。”^①

传统情报分析以动向为中心,分析人员围绕动向组织其工作流程,大量的时间被用来追踪时事,评估其重要性,发出预警。然而,信息技术和全球化迅速改变了这一情报分析环境,传统的情报分析模式趋于过时。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分析人员应超越传统的政治分析,把目标转向非传统安全威胁问题,帮助决策者理解复杂的技术问题,识别和理解新出现的各种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情报分析不仅应描述事实,更应进行趋势分析,识别那些打破先例和趋势的突变性事件,帮助情报用户理解情报现象后面蕴藏的真实含义,并提供多样化、可读化和可视化的情报产品。

信息时代的信息安全工作面临着更大的挑战。网络成为信息社会的基本架构,网络协议的开放性方便了网络互联,同时也为非法入侵者提供了方便。非法入侵者可以获得主机系统网络设备的超级用户口令,轻易地进入系统,实时窃取网络上的各种信息。手机、电脑、存储系统、电磁波……成为泄密“元凶”,信息安全成为各国情报与安全机构亟待解决的难题。为了挫败敌人的进攻,维护国家安全,情报机构必须发展强大的反情报能力,筑起信息安全的高墙。针对信息时代的网络安全问题,美国政府于2003年3月颁布了《确保网络安全国家战略》,明确美国在网络安全方面的战略目标是阻止敌对势力对美国重要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消除国家在面对网络攻击时的脆弱性。2008年美国《国家反情

^① Patrick J. McGarvey, C. I. A.: *The Myth and the Madnes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2, pp. 94 - 95.

报战略》特别指出网络反情报是美国反情报工作的重要使命,2009年美国《国家情报战略》把加强网络安全作为情报界的第五大任务目标。

二、影响军事情报工作发展的因素

各个国家的情报工作水平各有不同,各个阶段的情报工作发展速度也不统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决策者对战略环境及情报工作的认知以及情报文化,构成了影响军事情报工作发展的主要因素。

生产力的影响。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以人们的生产实践活动为基础的,对科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首先是物质生产的发展。军事情报工作也是如此。军事情报工作是军事和政治斗争的产物,它的直接作用对象是战争。战争形态越是复杂,对军事情报工作的要求越高,军事情报工作的发展越快。而对战争形态起决定作用的,正是物质生产水平。这是战争的物质基础,是进行战争的前提。诚如恩格斯所说,“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①。因此,从根本上讲,生产力水平是推动军事情报工作发展的第一要素。生产力水平决定了战争形态,决定了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水平,并最终决定军事情报工作的水平。

古代的生产力水平落后,战争规模有限,情报需求水平不高,情报搜集的局限性很大,人力搜集是主要的情报搜集手段,情报在战争期间的作用有限,决定战争胜负的是军事实力,而非情报。

近代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武器装备随之发生飞跃,战争的规模与激烈程度有了空前提高。战争的复杂化要求交战双方在战前就制定出详细的作战计划。为了满足这种战争需求,情报工作得到快速发展,敌国的军队数量、武器装备、军事学说、指挥体制、战争潜力成了情报搜集的目标,常设性的军事情报机构开始形成,军事情报理论开始成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6页。

型,出现了若米尼的《兵法概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一系列军事名著。

进入 20 世纪后,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和交通运输能力的提升,军队的机动能力大幅提升,战争规模进一步扩大,出现了总体战、闪电战等一系列新的战争形式。新的战争形态对情报的实时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军事情报工作随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科学技术的推动。在军事情报工作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因素非常活跃,它影响着军事情报工作的发展,对军事情报工作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就是科学技术在军事情报工作中的运用。

人类早期认识自然的能力十分低下,反映在军事情报工作中,就是军事情报技术的贫乏。早期的军事情报活动几乎全部依靠人力侦察。虽然出现了密写、密码等技术手段,但发展十分迟缓;畜力、烽火台、旗语是最基本的情报传递手段。情报处理全部依靠人的智慧。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 17 世纪初。

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促成了近代情报搜集技术的进步。1608 年,荷兰人利比斯赫(Hans Lippershey)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架望远镜,并用于荷兰与西班牙的战争中。1772 年法国人约瑟夫·米歇尔·蒙戈尔菲耶(Joseph-Michel Montgolfier)发明了热气球,1794 年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军使用气球进行了人类历史上首次航空侦察。1837 年发明的照相机为情报的记录和搜集提供了方便。美国内战期间,气球专家撒迪尤斯·洛(Ttaddeus S. C. Lowe)建议林肯总统用气球搜集情报,但由于气球的摆动及照相机拍摄的速度慢,侦察效果不佳。^① 1903 年秋,美国的莱特兄弟(Wright brothers)成功制造出世界上第一架动力飞机“飞行者 1 号”(Flyer I),实现了人类飞行的梦想。航空侦察开始成为人类一种重要的侦察手段。

^① 参见[美]迈克尔·贝斯洛斯《五一风云——U-2 事件内幕》,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95 页。

近代信息传输技术也取得了突破。1835 年底,莫尔斯(Samuel Finley Breese Morse)制成第一台电报机。1838 年 1 月,莫尔斯 3 英里收发电报的试验获得了成功。1842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开发电报技术的议案,随后决定拨款 3 万美元架设华盛顿和巴尔的摩之间的电报线路,全长 64.4 公里。1844 年 5 月 24 日,莫尔斯在美国国会大厅成功进行了电报机通信实验。电报的发明使远距离快速传递信息成为可能。有线电报促成了现代编码学的产生。1883 年,荷兰语言学教师奥古斯都·科克霍夫(Auguste Kerckhoffs)出版了《军用密码》(*La Cryptographie Militaire*),提出了密码编制的六条原则,编制出圣西尔密码(St.-Cyr)。1888 年,德国物理学家赫兹(Heinrich Rudolf Hertz)发明了一种电振荡器,证实了电磁波的存在。1895 年前后,意大利科学家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和俄国科学家波波夫(Alexander Stepanovitch Popov)根据赫兹的电磁波原理,分别发明了无线电报,实现了远距离通信的即时传输。

无线电使地球上任意两点间的通信成为可能,使战场上的军队可以随时与司令部保持密切联系,依靠马匹和信使传递情报和命令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发明不到 20 年的无线电,已经成为一种广泛使用的通信手段。飞机、舰艇、部队、军车上,到处可以见到无线电收发报机的影子。无线电技术的发展也导致了加密与破译技术的发展,现代密码分析学就此形成,技术搜集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情报搜集手段。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无线电密码破译作为一种主要的情报手段,已经初露端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超级”(Ultra)和“魔术”(Magic)命名的信号情报成为盟国克敌制胜的重要武器。战后,由于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无线电破译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来源。20 世纪 70 年代后,由 C⁴ISR 组成的作战指挥系统融情报、通信、指挥、控制于一体,情报既是决策的依据,也是一种有效的打击力量。如果没有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情报的这种功能是很难想象的。

总的说来,科学技术对军事情报的推动是间隙性、跳跃性的,这与科